

## 張遼「義勇襯揚」形象論析 —以關羽之情節對照為核心

莊奕軒\*

### 摘要

在《三國志演義》中，一眾虎將活躍於戰亂之世。而在小說家的點染下，讓關、張、馬、黃、趙此「五虎將」，比起《三國志》所載，以更加鮮明、飽滿的形象深植於人心。目前學界咸認為「五虎將」的形塑，當是以《三國志》五人合傳的概念出發，加以渲染而成。然而，在《三國志》中武將合傳的情形，並非只有蜀漢一例，尚有曹魏「五子良將」合傳（張樂于張徐列傳）、東吳「十二虎臣」合傳（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列傳）。東吳十二虎臣或因人數眾多而不易調動，然曹魏的五子良將，審酌其歷史記載，實也有發展成「五虎將」並稱結構的可能。然在《演義》中，此五人的形象描寫相對薄弱，其中，做為五子之首的張遼卻是著墨最多、雕琢最甚，此點實可深究，同時，在列傳中位居末位的徐晃在小說中的形象及戲份亦趨向揚高，超越了樂進、于禁、張郃，亦為可論。故本文出入文史之間，細細考索，提出以下幾點觀察：一、張遼在《演義》中的勇武表現基本上參酌《三國志》中的記載，加以渲染而成。二、在小說中出現大量張遼和關羽、曹操之間的互動關係，歷史材料乃從〈關羽傳〉中之注文發展而來。三、五子良將在《演義》中可加以渲染的情節實際上不少於五虎將，但總體上仍趨於平淡，但張遼作為關、曹兩人的「斡旋者」、以及關羽的「相襯者」，卻被有意塑造出了趨近完美的形象。故整體而言，在五子良將中，張遼的角色形象鮮明，深植人心，其出發點與作者對關羽的推崇息息相關。

**關鍵詞：**《三國志》、《三國志演義》、張遼、人物形象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生。

**On the image of Zhang Liao's "bravery against publicity"**  
**—The comparison with Guan Yu is the core**

**Abstract**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 group of tigers will be active in the world of war. In the wonderful works of the novelist, the "five tiger generals" of Guan, Zhang, Ma, Huang and Zhao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with a more vivid and full image than those contained in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t presen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shape of "five tiger generals" should be render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joint transmission of five people in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owever, in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ase of the joint transmission of military generals is not only the case of the Shu and Han Dynasties. There are also the joint transmission of the "Five sons and good generals" of the Cao Wei Dynasty (*Zhang Le in Zhang Xu liezhuan*) and the joint transmission of the "Twelve tiger ministers" of the eastern Wu Dynasty (*Cheng Huang Han Jiang Zhou Chen Dong Gan Ling Xu panding liezhuan*). The twelve tiger ministers of the eastern Wu Dynasty may be difficult to mobilize because of their large number. However, considering their historical records,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into a "five tiger general" structure. However, in the romance, the image description of these five people is relatively weak. Among them, Zhang Liao, as the first of the five sons, stands out from the crowd and shines brightly. This can be studied in depth.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e and play of Xu Huang, who ranks last in the biography, tend to rise in the novel, surpassing Le Jin, Yu ban and Zhang Ying. Therefore, between going in and ou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first, the brave performance of Zhang Liao in the *Romance* is basically based on the records in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Second,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Zhang Liao, Guan Yu and Cao

Cao in the novel,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developed from the annotations in the biography of Guan Yu. Last, in fact, the plot that wuziliang general can render in *Romance* is not less than that of WuHuJiang, but it still tends to be flat on the whole. However, Zhang Liao, as the "mediator" of Guan and Cao and the "contrast" of Guan Yu, has been deliberately shaped into a perfect image. Therefore, on the whole, among the five good generals, Zhang Liao's role image is distinct and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ts starting poi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uthor's praise of Guan Yu.

**Keywords:**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ang Liao, characters*

## 一、前言

《三國志演義》作為一部以史傳背景加入作者意識的講史小說鉅作，在其戰亂頻繁，諸侯角力的時代背景之下，塑造出了一眾形象深植讀者內心的文武名將，而在作者有意的渲染之下，特定人物的形象更顯得分外突出，最為人所知者文如諸葛亮、司馬懿、郭嘉，武如關羽、張遼、甘寧，皆以各自著名的事蹟活躍於文本，正如評書家袁闊成曾說的：「《三國演義》是那段歷史的一座人才寶庫，也是一部活的兵書，是一座軍事大課堂。」<sup>1</sup>這些人才在軍事、戰爭的場景烘托之下，更顯虎虎生風；其中在《演義》裡特別被羅貫中以刻意的標榜方式凸出的「五虎將」群體，更是加強了此五位名將在讀者心中的份量。

然而，綜看三國相關情節，所出現過可被標榜成為「武將群體」的武將並不只有五虎將一者，後世所稱者如呂布帳下八健將、東吳江表十二虎臣、曹魏五子良將等等，撇除呂布軍生存的時間段過短，而十二虎臣的群體過於龐大，情節安排不易，曹魏「五子良將」其實是在小說「五虎將」的設定之外，<sup>2</sup>另一個適合作為武將集團而給予一個名號的群體，

<sup>1</sup> 袁闊成評：《三國演義（上）》（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10。

<sup>2</sup> 綜觀前人研究成果，對於《三國志演義》五虎形象研究的相關文章，與本文較為相

其武將本身亦具研究價值。

目前學界針對相關人物進行討論者如曾世豪〈書生膽氣，大將才識—論《三國演義》文武關係與治亂隱喻〉<sup>3</sup>乃是針對傳統認為大將豪氣、書生才識的觀念做出反駁，認為在演義中，大將、書生各自具有不同的文武氣質，或可能兩者兼有，頗有創見；陳佩姣《《三國演義》中吳國武將之形塑研究》<sup>4</sup>則是針對東吳代表性的「三宿將」、「三名督」全面性的解析，對於角色形象、形塑手法有很深入的討論，值得參考；而針對曹魏武將的研究，針對武將群體的研究有于洪江〈試論《三國演義》對曹魏異姓將領的塑造〉<sup>5</sup>一文針對曹魏「諸夏侯曹」以外的武將分析，提出作者係根據「政治性」區別同、異姓將領的作用之觀點，頗值得參考；針對張遼的研究有魏汝霖〈張遼—曹營中第一名將〉、<sup>6</sup>姚大勇〈滄海橫流顯忠義—《三國演義》中張遼形象初探〉等；<sup>7</sup>其餘與五子良將個別人物的研究上有針對于禁者，有胡君暉〈于禁屈節的歷史反思—以李陵事件作類比思考〉、<sup>8</sup>胡升堂〈從于禁投降的下場，論戰爭哲學修養之重要〉、<sup>9</sup>魏

---

關，討論五虎架構者如陳香璉之期刊論文〈「五虎將」結構下的趙雲形塑—從史料素材到演義小說的藝術軌跡〉、碩士論文《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藉由五虎將框架下的視角針對此五位名將深入的分析，將五虎將系統的成敗、效用做出一番系統性的梳理；劉文菁《三國演義五虎將人物形象研究》等，係對於「五虎將」的藝術呈現及種種影響做出的討論；陳俊偉〈「並列思維」與五虎將—《三國志演義》醜化魏延的意義新探〉一文則以「並列思維」、「事數標榜」的概念，深入探討五虎架構的意義，並且藉由功績不俗卻不被列入五虎討論的魏延來做討論，對於五虎架構的意義有更上一層樓的解釋。

<sup>3</sup> 曾世豪：〈書生膽氣，大將才識—論《三國演義》文武關係與治亂隱喻〉，《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2020年），頁133-167。

<sup>4</sup> 陳佩姣：《三國演義》中吳國武將之形塑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

<sup>5</sup> 于洪江：〈試論《三國演義》對曹操異姓將領的塑造〉，《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第10期（1993年），頁40-44。

<sup>6</sup> 魏汝霖：〈張遼—曹營中第一名將〉，《山西文獻》第13期（1979年），頁65-68。

<sup>7</sup> 姚大勇：〈滄海橫流顯忠義—《三國演義》中張遼形象初探〉，《伊犁師範學院學報（文理綜合版）》第2期（1999年），頁37-40。

<sup>8</sup> 胡君暉：〈于禁屈節的歷史反思—以李陵事件作類比思考〉，《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12期（2014年），頁22-25。

伯河〈三國名將于禁生平及「弗克其終」考〉<sup>10</sup>等。

對於五子良將之個別研究，如上文中所呈現，集中在張遼、于禁兩人，除上文所列舉之外，尚有肖洋〈于禁駐紮之城考〉（《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 2 期（2021 年））、付開鏡〈關羽與張遼、徐晃的友情〉（《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 6 期（2012 年））等等，但除姚大勇所撰有對於張遼的形象做出論述外，其餘皆非對於《志》、《演義》的角色形象做出之研究成果，對於于禁的研究集中於其弗克其終的意義（與本文或有間接相關，但以往的研究成果集中於討論歷史意義，而非藝術效果），對於樂進、張郃、徐晃三人形象的研究則寥寥無幾，故仍保有廣闊的討論空間。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人從《三國志》歷史人物的身分轉而成爲文學家筆下人物的轉換過程，可論之處實爲可觀，然礙於篇幅，本文擬先以正史中資料完整、在《演義》中也佔據較多戲份、形象塑造最爲完整的張遼作爲研究核心，並以《演義》形象相對正面且與本文將提及之關羽具有互動關係的徐晃加以佐證，探討其二人之形象塑造以及角色定位。

本文所討論之角色形象，將會以《演義》的內容爲主體（主要以毛本爲研究文本），<sup>11</sup>佐以《三國志》的史料、事蹟，進行交互對照，嘗試從中尋找出繼承、轉變、增強、弱化的種種關係，先從史傳到小說的轉變論起，談《演義》中塑造張遼各種形象的目的，預期呈現的角色定位爲何，同時以同爲五子良將的徐晃形塑作爲第二證據，說明創作者是如何將兩者形象，與「義絕」關羽的角色形象產生關連。以下，便先從張

---

<sup>9</sup> 胡升堂：〈從于禁投降的下場，論戰爭哲學修養之重要〉，《中原文獻》第 50 期（2018 年），頁 24-36。

<sup>10</sup> 魏伯河：〈三國名將于禁生平及「弗克其終」考〉，《泰山學院學報》第 42 卷第 5 期（2020 年），頁 44-48。

<sup>11</sup> 《三國志演義》的版本繁多，前人對此的研究亦已堪稱完備，具有系統，如沈伯俊在〈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的新進展〉一文（《社會科學研究》第 154 期（2004 年），頁 151。）中，便將「《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三國志傳》系統」及「毛宗崗父子評改本《三國志演義》系統」三類；然本文旨在討論五子良將的藝術塑造成果，故以流傳最廣，並被魯迅評爲此書一出「一切舊本乃不復行」的毛批本作爲研究範圍，若非必要則不在此文中對其餘的版本內容進行分析。

遼在《三國志》中記載的情形，以及過渡到《演義》後的呈現論起，討論張遼在小說中武勇形象如何受到正面塑造，及其「忠義」的核心意識。

## 二、使賊奪氣，國之爪牙—「義勇」形象樹立之雕琢

《三國志·魏書十七》中將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人合傳，並且在傳末有評道：

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sup>12</sup>

隨著民間流傳，故有「五子良將」之稱，而這種武將並傳的情形在史書上也並非孤例，在《蜀書》、《吳書》也有類似的情形，正如陳香璉在其文章中所注意到的：

中國的史學向來有以類相從的傳統，陳壽在《三國志·蜀書》卷六，首先將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這五個人合傳，卷末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三國志·魏書》卷十七，陳壽對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人的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還有《三國志·吳書》卷五十五對吳將的評語：「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顯示出陳壽將這些將領各自在《魏書》、《蜀書》、《吳書》中合為一傳，除了表明他們都是該集團的重要將領外，也分別是魏、蜀、吳的開國元勳。<sup>13</sup>

可知在《志》中的武將合傳乃是現今「五虎將」、「五子良將」、「江表十二虎臣」的來源，<sup>14</sup>作為武將方面的主角而形成的群體，〈張樂于張徐傳〉在正史中的重要性實際上不亞於蜀漢五虎，且又是在傳末被作者評曰「時

<sup>12</sup>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台北：世界書局，2012年)，頁531。

<sup>13</sup> 陳香璉：《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頁18-19。

<sup>14</sup> 此三類武將群體差別在於「五虎將」被《演義》作者有意識的拉抬作為蜀漢的主要作戰角色，在《志》中反而沒有明確的被陳壽給予一個總體的評價(詳見注2、3)；而「五子良將」、「江表十二虎臣」則是在《志》中被給予了「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的評價，轉而在現今的網路、遊戲發展過程中，演變而來的口傳名稱。

之良將、五子爲先」，儼然已經具有被標榜成爲一個武將群體的先天條件，但在《演義》中的呈現卻全然未見作者有如此設計的意願，但身爲五子良將之一的張遼卻又鶴立雞群的被作者大力美化，呈現出了戰神般的優秀形象，這是在其他人身上所未見的，<sup>15</sup>其背後原因實爲可議。

張遼在〈張樂于張徐列傳〉中居五人首位，記載達 1669 字，同爲五人之最，《演義》中保留了張遼在正史中記載的征袁尙、斬冒頓等等的戰績，又增加了官渡斬蔣奇、計殺太史慈，以及帶兵參與眾多重要戰役的情節，並且由曹丕親口做出「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之高度評價，<sup>16</sup>對於張遼武勇形象的塑造可謂是不遺餘力，其中較爲特別的便是作者爲張遼虛構了一段在合肥與東吳名將太史慈對陣的情節：

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

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數十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

不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

---

<sup>15</sup> 除張遼之外，同爲五子良將的徐晃亦是被美化的角色之一，但與張遼不同的地方在於，演義中的徐晃在與蜀漢角色同場出現時，往往以敗績呈現，與張遼接近完美的形象有所不同，後文將論。

<sup>16</sup>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頁 518。

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礮，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sup>17</sup>

此段故事全然未見於史冊，其之所本或脫化自本傳中所記張遼平謀反事，文云：

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sup>18</sup>

太史慈其人的末路在歷史上也並非如此戲劇化，作者卻將與此段情節風馬牛不相及的吳將太史慈與此背景融合，這樣一段張、太史兩名位名將的交鋒對壘，全然為張遼的武勇做出背書，不僅是以一己之力成功指揮作戰，擊殺同為大將的太史慈，也藉由諸葛瑾所言之「張遼多謀」為張遼作為「有勇有謀」的大將風範做襯，為其後在合肥戰場刻劃張遼「威震逍遙津」一事墊下強而有力的鋪陳。

在這些戰爭相關的情節中，又以第 67 回「威震逍遙津」的段落最為人所知，而這段故事其實有史所載，而轉以小說家筆法予以轉化、擴寫，史載：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

<sup>17</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606-607。

<sup>18</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頁 518。



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sup>19</sup>

《演義》對於這段記載基本上全部吸收呈現，並虛構了孫權爲了活命縱馬飛躍小師橋的橋段：

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片板。孫權驚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將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sup>20</sup>

這段故事對於形象的塑造，正是作者有意彰顯張遼威武形象的最好例證，先是保留了史冊中對於張遼這場勝仗中的戰績描寫，再新增了孫權倉惶逃難，慌不擇路才得以僥倖逃脫的橋段，更顯現出了張遼的威風，在最後又作出了「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的這段虛構敘述，將張遼的形象造成了一個高大威武、生人勿近的名將形象，儼然有些關羽萬人敵的影子，與前文所提之計殺太史慈情節兩造相互輝映之下，更讓張遼的英勇顯得具體化、形象化，這樣子在忠於史料的基礎上，在人物個性以及戰爭形象加以渲染的手法，便可以初步的看出作者係有意的對於張遼這個武將角色嘗試做出有別於其餘魏國將領的定位。

而在《演義》中，作者同樣爲徐晃設計了一些增添武勇形象的橋段，

---

<sup>19</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頁 518-519。

<sup>20</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94 年 9 月），頁 770-771。

其中最大的增添便在於他的登場，初登場便設計了將李樂一刀斬於馬下之橋段，其後則是對於徐晃歸曹一事設計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橋段，在史冊中，徐晃歸曹一事僅用「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幾句簡短帶過，然《演義》作者卻想像出了一段，先是曹操派遣許褚與徐晃大戰五十餘合而平分秋色，在欣賞之餘，派遣與之有一面之緣的滿寵作為說客，前往說降的橋段：

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晃沈吟良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為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為。」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sup>21</sup>

在這段故事中，將徐晃的登場凸顯得格外威風，使得求才若渴的曹操極力網羅一事且可不論，更為重要的是，在滿寵與徐晃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賦予徐晃一個「義將」的形象，即滿寵在勸降徐晃之時諫其順帶弑其舊主以為投誠之禮，但徐晃以大義之原則拒不為之，引得滿寵出言感嘆，此舉一來降低了徐晃作為一名「降將」帶來的負面印象，二來為了其後徐晃作為張遼之外，曹營中唯一與關羽有交情之人作為鋪墊。<sup>22</sup>

承上所言，不論是對於張遼代表性戰役，或是對於徐晃登場的情節，《演義》作者或有所承襲，或增添改寫，皆可看出有意識的為兩位魏將設計出了特別的藝術形象，其中，「義」的加入在《演義》中，於蜀漢陣營以外是非常罕見的，歐陽健曾說：「羅貫中的高明之處在於，既將闡發《三國志》蘊含的『義』為目標，又並非簡單的重複史書的陳舊觀念。」

<sup>21</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160-170。

<sup>22</sup>演義第二十七回中有言：「卻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323。

<sup>23</sup>只要「義」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的某個人物身上，我們便可將之視為特別的，又以張遼在小說中的形象塑造，皆圍繞著「威武、義勇」等形象，張遼與關羽在小說中的互動同樣賦予張遼一個「義」的身分，其出發點及塑造意識實為可論。

而細探此現象之可能成因，實不離關羽角色的深刻影響，張遼乃至徐晃之角色定位即有可能便是為了服務作為「義」的主角關羽而做出了若干改變，而其中心思想及主要目的乃是欲藉張遼等人之形象抬高，間接地讓關羽的形象做出等比例的襯抬，然其手法及實際效用，於下節再敘。

### 三、居中斡旋，義勇相映—「義絕」對照書寫之法式

現學界對於關羽的各類研究誠可謂汗牛充棟，關羽作為《演義》主要主角之一已為定論，小說作者對於關羽形象的各種塑造皆有完整之研究，周思源有言：

到了三國演義裡，關羽形象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這就是大大強化了關羽的忠義，尤其是義，而且重點有所改變。<sup>24</sup>

歐陽健亦言：

關張之義，是演《三國志》蘊含之義的「義中之義」……，《三國志演義》極力渲染的是關羽的義，反映了思想底蘊的深化。<sup>25</sup>

誠如兩者所言，關羽在小說中最重要的形象便在於其之重義，楊義也稱關羽之忠義形象為小說賦予之「典範化」：

關羽形象典範化，更帶本質意義的是給他注入一種忠義蓋世、儒雅絕倫的道德內涵。……使敘事操作出現了超越人間規矩法度的「超

---

<sup>23</sup> 歐陽健：《歷史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83。

<sup>24</sup> 周思源：《周思源品賞三國人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7。

<sup>25</sup> 歐陽健：《歷史小說史》，頁84。

常規性」。<sup>26</sup>

正是這樣典範化的形象塑造意識讓關羽在《演義》的出現、表現皆脫離不了「義」字的牽動，為主征戰是義、報恩斬將是義、義釋曹操是義，故被毛宗崗評為義勇將軍之「一絕」。<sup>27</sup>

回觀張遼，小說中，除去渲染英勇形象的場景之外，《演義》為張遼虛構最多的情節在於與關羽間的關係，在《演義》中，可以看到許多張遼、關羽兩者之間交情相關的情節，其中最為重要者可歸為三，即「白門樓乞活、約三事、義釋曹操」。

在第二十回繼前回呂布戰敗白門樓之後的情節中，小說作者設計了劉備、關羽為張遼求情乞活的情節：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sup>28</sup>

此段是張遼、關羽兩人在整個《演義》中關係的開始，綜觀整部小說，但能使關羽下跪乞活，張遼可謂唯一，對話中，關羽對張遼所做出的「忠義」之評價，便或多或少說明了作者設計關羽做出此一舉動之內在動機，在這段情節中，首度牽起關羽、張遼二人「義」的關聯，並在小說中一路牽動著兩人之間的交互關係，毛宗崗便直接在此段後以一句話評之：「為後文張遼土山救關公張本。」可見毛宗崗亦對於張遼之於關羽情義關係之脈絡有所留意。

<sup>26</sup>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250。

<sup>27</sup>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云：「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著重言關羽情義是為古今武將之一絕，習稱為「義絕」，頗適用於本文於張遼、關羽兩人對照關係，故本文乃採此慣稱作為論述中對關羽之代稱之一。

<sup>28</sup> （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243。

又第二十五回中曹操命張遼前往勸降關羽，後來相約三事，亦是本著兩者有深交的緣故：

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sup>29</sup>

更有其後在關羽過五關斬六將後曹操指派張遼前往送離關羽等等的情節都顯示出張遼與關羽的好交情，同時也可以推測，作者在設定張遼與關羽之前的情感關係時，目的並不只是將兩人的關係僅只塑造成救命恩人、好友的關係，而是欲使張遼在整個小說故事中佔據一個不可取代的獨特地位。

最後則是出名的「關羽義釋曹操」之情節，曹操敗走赤壁之後，關羽在華容道因舊情放走曹操一虛構情節成爲討論甚廣的一個橋段，周思源便說：

《三國演義》虛構了「關雲長義釋曹操」這個故事，就是要突出關羽在忠和義發生矛盾時的態度，或者說，要表明作者的某種觀念。<sup>30</sup>

明確指出這個釋放曹操的動作，其原本的創作意識便很可能是爲了服膺關羽義絕的身分，讓關羽的「義」成爲這個角色最高層次的原則，而在關羽一度後悔意欲截殺曹軍時：

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眾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sup>31</sup>

張遼便撥馬而至，讓關羽下定決心放走曹軍，這個設定顯然有所寓意，作者何以設定張遼、關羽這一段不帶任何對話，甚至沒有眼神交流的敘述情節？關羽衡量是否釋放曹操的關鍵在於關羽與曹操曾經有過「君臣

---

<sup>29</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303-304。

<sup>30</sup> 周思源：《周思源品賞三國人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69-70。

<sup>31</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850。

之義」，而若僅僅是為時不長，且早已報還的君臣之義，便要關羽做出釋放曹操這個影響大局的舉動，未免有些牽強，這時加入了一個與關羽具有深交設定的張遼角色出場，不必多加贅敘，便能自然的加入「友情之義」的概念，讓關羽在兩種「義」的心理因素影響之下，方才做出如此影響深遠的決定，也更使讀者自然產生關羽重情重義的心理印象，周思源也在其後說道：「所以在華容道事件中，關羽是讓忠服從了義。」忠義兩全一直是故事中作者極欲賦予關羽的一個角色中心形象，而在此卻爲了讓關羽的「義」之形象更進一步的提高，只不得不讓忠的因素些微下降，張遼的角色更在其中呈現了最後一根稻草的作用。

我們以另一個與關羽具有交情設定的角色徐晃爲對照，《演義》中的描寫在於樊城之戰徐晃進攻關羽，對陣之時的對話：

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眾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sup>32</sup>

但觀看《三國志》中的記載，傳記正文中並沒有出現任何張、徐兩人與關羽之間有交情的記載，相關的記錄係出現在〈關羽傳〉的注中，魯迅曾說過：「三國時的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國志》甚爲詳細，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國的事情。」<sup>33</sup>故裴氏之注於史至小說的重要性可以見之，此處亦同，

<sup>32</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859。

<sup>33</sup>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收於《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 319。

在曹操派張遼探問關羽留魏與否的段落，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sup>34</sup>

而在樊城之戰的段落，裴松之注引《蜀記》曰：

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sup>35</sup>

可以看到《演義》中徐晃與關羽的情節基本是照搬《志》中裴注的情節，而稍加潤色；但張遼方面，則是僅由一段張遼自己內心天人交戰的情節，發展出由白門樓劉、關救張遼開始一直到張遼送別關羽歸蜀，而後成為關羽放曹一事關鍵人物等一連串的交流；張遼與徐晃在《演義》中皆是屬於大幅正面書寫的角色，尤其著重於兩人情義相關的道德層面，這正好與作者大力渲染關羽「義絕」形象具有相互呼應的效果，則作者將張、徐兩人與關羽之間的交往情節加以渲染亦不怪矣。

承上言，張遼在《演義》中屬於相當少見，並非身在蜀漢而被大幅正面塑造的武將角色，除此之外，可舉的僅有徐晃、陸遜、鄧艾等，寥寥無幾，故此張遼何德何能被小說家做出如此形象安排，作者必有所圖，除了本身在史書上本就具有質、量上的素材優勢之外，小說家刻意為他們所設計的一些情節、角色關連，其背後目的與「義」的設定息息相關。

張遼做為出色的一員良將，具有眾所皆知，被小說家渲染成大殺四方，無人能擋的「合淝之戰」，「威震逍遙津」的代表性戰績，更有著大敗袁尚、箭傷黃蓋、計殺太史慈等等的赫赫戰功，亦被關羽稱為「此人（張遼）武藝，不在你（張飛）我之下」。<sup>36</sup>

種種的情節都顯示小說家有意將張遼塑造成為魏國的第一大將，然

---

<sup>34</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頁 940。

<sup>35</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頁 942。

<sup>36</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224。

而魏國在《演義》中堪可擔任第一大將的角色何其多，舉凡曹操宗族的曹仁、夏侯惇等人，乃至徐晃、張郃，若稍加潤色，都可能具有擔綱如此角色之背景與實力，而張遼卻雀屏中選，其作用與目的為何？對此，基於史料與演義的對照，推測作者欲交付於張遼的角色任務主要有二，一是做為「曹操、關羽的斡旋者」，二是關羽義勇的「相襯者」。

首先是「斡旋者」之角色，閱讀小說中增添的情節，可以發現，作者給予張遼在作戰之外的一個重大任務，正因小說中大力渲染了曹操、關羽兩者間的多重情感，在不同陣營、不同利益基礎的兩人需要進行一段重要的交流之敘事需求之下，在兩者中間的溝通者便顯得尤為重要，於是，在《關羽傳》的注文中，被提及的張遼變成為了擔綱這個任務的不二人選，作者將《三國志》裴注中張遼在曹操、關羽兩人溝通過程中的一段內心戲，發散擴大成為貫通整段故事的兩人關係，其中尤以前章提及的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一段最為可見，或許是為報白門樓乞活之恩，張遼在小說中的這段情節中可為不留餘力，在關、曹之間來回勸說，一方面以「義」說降關羽，讓關羽的投降舉動在義的背書下增添了合理性，一方面又以劉、關的情義為例說服曹操接受而約三事，從而使張遼在這段故事中成為了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曾世豪就曾對此回中張遼所佔據的要角作出說明，先是引了張遼在故事中的文句後提到：「張遼是關羽所認可的『忠義之士』，驍勇善戰，本來是呂布部下，但在白門樓歸順曹操。張遼雖降，但不全是毛評所謂『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的人物。」<sup>37</sup>在此便可見張遼基於其同時具有「義」的形象以及「魏」的將領兩個角色設定，從而擔綱了在約三事的劇情中連絡雙方的角色。從起初關劉救遼，到關羽降曹前後張遼的居中斡旋，再到關羽歸劉擔任傳令救援、與曹操一同送別的種種橋段，在義釋華容的橋段，也作為讓關羽鐵下心抗命放曹的角色壓軸登場。而在這樣的角色設定下，張遼作為武勇主角關羽的好友，在具有與關羽可相論衡的「義」，以及身居曹魏陣營的角色身分之下，當仁不讓的成為了曹、關之間的「斡

---

<sup>37</sup> 曾世豪：〈操之忠，漢之賊也：論《三國演義》曹魏人物之「忠義」評價〉，《淡江中文學報》第44期（2021年），頁108-110。



旋者」。

二是關羽義勇的「相襯者」，歐陽健說：「『義』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推測，更是要發揚人們在患難中互相救援的精神。」<sup>38</sup>承此言，回觀關羽在白門樓出言相救張遼一事，正開啓了關羽、張遼兩者在「義」這個主題上互相襯托的故事設定，故事中反覆藉由張遼的義與勇的表現，側向的引導讀者由此對關羽進行道德推測，從而達到兩者相互襯托輝映，同時達到抬高兩者義勇形象的藝術效果，而張遼本人既然擔綱了與可稱是故事主角之一的關羽之相襯者的身分，若不具備與「義絕」關羽相應的人格，以及足夠與「大將」關羽匹配的戰功，這段關係的設定便難免為人詬病，正如同毛宗岡所評：

張遼之守合肥，其真大將之才乎！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歟！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sup>39</sup>

如此想來，便不難理解作者為何將張遼的角色地位安排的如此之高。

反觀徐晃這個角色，雖然同樣作出了與關羽有著交情的設定，在處理上卻與張遼有些微不同，比起「相襯者」，徐晃在小說中更像是作為「對手」而出現的，雖然在小說中仍有描寫到徐晃與關羽具有交情，但不同於張遼與關羽之間的大力書寫，兩者間的情分如前節所提，除去第 27 回中提到「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外，<sup>40</sup>僅於兩者在樊城對陣時，叫陣之語中所透漏的兩者關係，其中提到「兩人有舊」、「交契深厚」，但並未說明兩人如何有舊，交契何來，雖同樣典出《關羽傳》的注文，對於關、徐關係的描寫更像是把史書中的文句轉為小說筆法而已；但徐晃作為能夠打敗關羽的對手，小說家自然不可能把徐晃寫成一名泛泛之輩，進而損害關羽的威猛形象，斬崔勇、李樂、搆審配等等的武勇表現都使得徐晃呈現出威武無比的形象。

---

<sup>38</sup> 歐陽健：《〈三國志演義〉的忠義問題新說》，收於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選編：《〈三國演義〉論文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41-42。

<sup>39</sup> （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608。

<sup>40</sup> （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323。

在關羽將臨末路之情節，需要出現一名終結關羽無敵形象的角色作為故事的收尾，除去最後動手的東吳諸將，曹魏方便由徐晃擔任這個角色，在前文中有提到，徐晃從登場開始，就被作者有意識的塑造成了一個帶有「義」這個高度的武將，並且與關羽有舊，又不似張遼與關羽關係深厚如斯，由他作為關羽對曹魏方最終的對手，除了將整個對陣以義的高度包裹之外，更因關、徐交情僅止於此，而顯得徐晃公私分明、無念舊情，同時也因徐晃被營造成關羽對手的角色身分，讓關羽之敗，除了因舊傷未癒的外在原因之外，也並非敗於一介來路不明，武勇不強的隨便角色，而是敗於義勇的徐晃，讓關羽之敗之整段故事，合理性上更加完備。

上述兩者身處曹魏陣營時，統兵征戰皆可謂是常勝將軍，雖可說是為了使與關羽具有相對等的戰力與形象所做出的有意雕塑，但同時也可能造成關羽作為主角時，應該要獨樹一格的戰鬥力顯得不夠突出，或許作者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故在小說中但凡遇到與蜀國人物相關的情節，作者往往會使他們出現一些瑕疵，最顯著的片段在於官渡之戰時，張、徐二人雙戰文醜，卻是落得一傷一退：

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簷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

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sup>41</sup>

而關羽一出，卻是輕鬆的手起刀落：

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翻，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遶

<sup>41</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314。

河而走。那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sup>42</sup>

此處的描寫卻是將作者有意抬高到與關羽相似地位的張、徐二人的武勇程度與關羽呈現出極大的落差，暗示讀者雖張、徐二人具有不輸關羽的人物素質，但在整體的實力顯現上，仍不及關羽。而在關羽為徐晃所敗之後，又作出關羽係因「舊傷未癒」而敗的補救，可稱是在抬高張、徐二人人物素質的同時，對於關羽主角的獨一無二性所做出的補強處裡。

類似的情形還出現在徐晃統兵的漢水之戰，其時副將為王平，王平後投降蜀漢，成為諸葛亮後期重用的將領之一，故在這段戰事中，便設計了一段徐晃不聽王平建言強擺背水陣，大敗而回的情節：

卻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

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

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為偏將軍，領鄉導使。<sup>43</sup>

這樣一段情節完全呈現了即將降蜀的王平是如何料敵機先，而反觀徐晃卻是如此的剛愎自用，這樣的形象顯然與平時作者所塑造出徐晃的沉著形象落差過大，全然不像是曹操所稱讚的「膽識兼優」，反倒落的有勇無謀了，此處正可與前文所提，被吳將諸葛瑾評論為「多謀」的大將張遼相比，更可呈現出張遼在小說中的形象塑造的獨到之處。

---

<sup>42</sup> (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314-315。

<sup>43</sup> (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819。

除前文中所羅列諸多針對文本情節明顯能看出對張遼角色塑造之有意調整可做為證據之外，對於張遼的獨特形象，我們還可以從版本的流變之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前文有言，張遼在小說中的種種情節，其實僅發源於《志》中裴注所引的一段文字，而實際上，這段故事在目前可見知最早版本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可見，在屯土山約三事故事之後，曹操因關羽心向蜀漢，內心鬱悶之下，派遣張遼前去探聽關羽口風，呈現如下：

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某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只懷去念，何故也？」公曰：「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方去。」遼曰：「倘玄德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耳。」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遼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歎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弟兄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室。以實告操曰：「雲長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歎曰：「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曰：「然。」<sup>44</sup>

可以看到，在裴注中所記載，張遼天人交戰之後選擇寧為不義，不為不忠的抉擇是完整被呈現在故事中的，而據查，其後諸本含李卓吾評本、周曰校本之內容文字，也都完整保留了這一段情節，未曾刪改，但到了毛宗岡本，這一段棄義從忠的橋段卻整段被移除，內容如下：

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

<sup>44</sup>（明）羅貫中著，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56。

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  
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

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  
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sup>45</sup>

可以看到上文所言之故事整段被毛宗崗所刪去，而根據文字的完整性以及接續程度也可以判斷不可能為筆誤漏抄，這樣一來，為何此段故事會遭到移除便值得注意，實際上，毛宗崗在他的評語中，便曾經將張遼歸類在「但知有曹，不知有漢」的魏將群體之中，因此就算此段故事仍舊存在，讓一心向曹的張遼做出捨義就忠的行動實際上也並不影響故事整體，但毛氏卻做出如此更動，我們或可推測，毛氏在讀《演義》時，便可能注意到張遼角色與關羽形象之間的牽動關係，因此，與其讓張遼做出「棄義」的舉動，不如在不影響整體故事性的情況下做出更動，捨棄了天人交戰的情節，避免讓張遼背上一個「忠義不兩全」的缺陷，讓張遼整體的「忠義」形象變得更加完整，在與關羽之間的情節互動之時，也更能生動地呈現出兩者之間情義所在。

總體而言，雖然在遇到與蜀國有關的情節時，出於作者自身尊劉抑曹的情感認同作用以及對於主角設定的服膺之下，不免對於張、徐兩者做出一些不符合其人物設定的形象，但可稱是白璧微瑕，基於對關羽的相襯、相對作用看來，小說作者對於這兩員「大將」的形象塑造上還是成功的，就像曾世豪在其研究中提到的：

「大將」與「戰將」之差異，就在於有無見識、才識，而非有勇無謀，趙雲、姜維、張遼、徐晃、鄧艾等人，顯然是膽識兼優的代表。<sup>46</sup>

<sup>45</sup>（明）羅貫中著、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308。

<sup>46</sup> 曾世豪：〈書生膽氣，大將才識——論《三國演義》文武關係與治亂隱喻〉，頁 163。

作為曹魏陣營中代表性的「大將」人物，其「膽識兼優」的形象塑造刻劃之深，足以讓讀者在如此的審美體驗中，忘卻了作者因情感認同而不慎流露出的人物設計瑕疵。也在版本不斷流變的情況之下，經過毛氏的改動，讓張遼的形象更加的完整、合理。張遼作為襯抬關羽形象的角色，在作者的筆下適時的出現、適時的展現自身的能力，讓身為《演義》主角之一，同時具有友情關係的關羽，義勇的形象成功的提高了一個層次。

#### 四、結論

時至今日，對於《三國志演義》的角色形象研究已具規模，大部分主要角色在小說中的形象、轉變，都已有了研究結果，然除蜀漢以外的武將角色，往往遭受忽視，如禳夢庵便稱：

操幕下人才，第一流者不多，將帥中張遼、徐晃、張郃頗有大將風。……均尚有獨當一面之才，然大體來說仍是戰將，都需在曹操直接或間接的指揮下，才能立功。<sup>47</sup>

僅將二人當作接受命令的戰將而論，但許多非主要角色的三國武將角色在小說中同樣具有多樣變化的形象呈現，仍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本文所言及之五子良將即是其一。本文先以張遼從《志》到《演義》的過渡、轉變著手，分析了小說作者將張遼、徐晃二歷史人物題材做出了如何的揉捏，才成為小說中的角色；再藉由兩者與曹操、關羽的關係，在居中斡旋、襯抬關羽的敘事前提之下，是如何被作者所推揚。

綜觀以上所述，《演義》作者以清楚可見的方式大力提高了張遼、徐晃在小說中各方面的色彩，其真實目的乃是為了間接提升關羽在小說中所被歌頌的義勇形象，就像毛宗岡評「惟大將能知大將」，先是鋪墊了不同陣營的「大將」與「大將」之間的交情、互動，再藉由這三位大將日後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英勇戰績，對讀者心理作出暗示，在同時渲染三者義勇的手法下，成功達成了將關羽的義勇形象抬升到更高之目的，也將張遼、關羽兩人彼此的友誼關係確立，使兩人儼然成為「曹營

---

<sup>47</sup> 禳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49。

中的關張」，其寫作方式不可謂不精妙，而在這種寫作意識的感染之下，張遼其人之英勇、情義種種正面形象也隨之深植讀者心中，成爲五子良將中，在小說裡當仁不讓的首位，同樣與關羽具有情誼的徐晃也隨之受惠，加深其武勇形象，惟五子良將之其餘三人卻不具備這種條件，在小說作者「尊劉」的思想傾向之下受到冷落，其三人在《演義》中形象塑造的成敗尚存可論之處，只待日後他文再論。

## 引用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台北：世界書局，2012年)。  
(明)羅貫中撰、吳小林校注：《三國演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

### 二、近人論著

- 于洪江：〈試論《三國演義》對曹操異姓將領的塑造〉，《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第 10 期（1993 年），頁 40-44。  
周思源：《周思源品賞三國人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姚大勇：〈滄海橫流顯忠義—《三國演義》中張遼形象初探〉，《伊犁師範學院學報(文理綜合版)》第 2 期（1999 年），頁 37-40。  
胡升堂：〈從于禁投降的下場，論戰爭哲學修養之重要〉，《中原文獻》第 50 期（2018 年），頁 24-36。  
胡君暉：〈于禁屈節的歷史反思—以李陵事件作類比思考〉，《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12 期（2014 年），頁 22-25。  
袁闊成評：《三國演義上》（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2 月），頁 2-10。  
陳嫻姣：《《三國演義》中吳國武將之形塑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陳俊偉：〈「並列思維」與五虎將—《三國演義》醜化魏廷的意義新探〉，《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10 期（2011 年），頁 27-50。

- 陳香璉：〈「五虎將」結構下的趙雲形塑—從史料素材到演義小說的藝術軌跡〉，《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11 期（2012 年），頁 99-120。
- 陳香璉：《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 曾世豪：〈書生膽氣，大將才識—論《三國演義》文武關係與治亂隱喻〉，《漢學研究》38 卷 4 期（2020 年），頁 133-167。
- 曾世豪：〈操之忠，漢之賊也：論《三國演義》曹魏人物之「忠義」評價〉，《淡江中文學報》第 44 期（2021 年），頁 101-134。
-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禡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 劉文菁：《三國演義五虎將人物形象研究》（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年）。
- 歐陽健：〈《三國志演義》的忠義問題新說〉，收於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選編：《《三國演義》論文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歐陽健：《歷史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魏汝霖：〈張遼—曹營中第一名將〉，《山西文獻》第 13 期（1979 年），頁 65-68。
- 魏伯河：〈三國名將于禁生平及「弗克其終」考〉，《泰山學院學報》42 卷第 5 期（2020 年），頁 44-48。